

# “客观性”辨析

邢冬梅

(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逻辑实证主义忽视认知主体的力量,把客观性视为一种统计学上的平均,其目的是消除和控制情感、偏见或利益的导向,结果之一就是认知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被化归或消失,认知者或观察者逐渐消失,成为一种自我记录的装置。社会建构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强调认识中的主体力量,视客观性为一种社会建构,客观性变成一种修辞学,一种权力,结果是滑向相对主义,并把科学意识形态化。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实证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处于问题的两个极端,关键在于它们都是脱离了科学实践去考察认识过程。

**关键词:** 客观性;实证主义;建构主义;科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3 - 0037 - 04

(1)客观性是指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的反映,这是科学知识的最基本属性。一种客观的真理假说比其竞争对手获得了更有力的证明支持,即更准确、更接近自然真理。(2)客观性体现了科学探索的方法与规则(统计平均、实验或实验的重复等)的性质,这些方法使得标准化、客观化或其它一些被认为有利于公平的性质达到最大化。在这种意义上,客观性被归咎为个人的无偏见性与无私利性的判断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消除强加在知识上的任意的与偶然的因素。(3)客观性与科学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即真理的诉求,不管其来源如何,都服从于预定的非个人标准,只要求与观察和早已被证实了的知识相一致。一种学说,不管是被纳入科学之列,还是被排斥在科学之外,都不依赖于提出这一学说的个人或社会属性:他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都与科学无关。

## 一 实证主义与“客观性”

在科学哲学发展中,拉卡托斯把描述与规范之间的差别赋予了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的分界。传统上,内部主义的核心观点仍然强烈拒绝在知识研究中的社会学的介入。中性的观察陈述与理论陈述二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强调证明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的内部与外部的二分法,一直是传统科学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之一。哲学家开始把科学事业分割为不同的活动,发现的活动与评价科学结果的活动,只有后者才与哲学有关。也就是说,产生科学知识的过程是与为这些结果辩护的过程无关的。这种划分拒绝哲学

进入真实的科学过程的研究。在波普的语言中,客观知识是没有认知主体的知识,布鲁尔称之为“个体主义的经验论”,巴恩斯称之为的“个体主义的理性主义”,在罗蒂的语言中,客观性不过是自然之镜,借助于它,所有的偶然性都被消除。传统的科学哲学是“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这是哲学家所依赖的认识论基础。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科学方法的理性原则(内史因素等),其目的是用来直指消除、或至少使认知者远离可能模糊、歪曲或使他们的观点带有偏见的经济与社会因素。这种僧侣似的哲学家,建立和保护着客观性的神圣制度,在其中,科学只是被理性(逻辑)与实在(感觉证据)的内部的和纯粹的力量所驱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客观性和理性通常被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理性针对科学论断的评价过程,客观性则是针对这个过程的产物。理论选择应该是理性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理论的选择就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实在论者认为这种客观性奠基在认识论的标准或规则上,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理论的发展才被视为客观的(或理性的)。结果,在认识过程中,这些标准和规则会把科学家的双手反绑在他们身后,从而保证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不过,采用这种观点仍需要特殊的努力,因为客观性并不是自然产生的,相反,它要求消除世俗的偏见与侵害,不经过科学共同体的系统的与长期的艰苦规训、训练与控制,认知者就不可能具有客观化的能力。这样,避免偏见与歪曲就会要求一种特殊的气质与美德;一种英雄式的与苦行修道者的自我归同与共同体社会成员的认同。

【收稿日期】 2003 - 12 - 09

【作者简介】 邢冬梅(1964 - ),女,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2002级博士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

这样,借助于理性的贡献,客观性的结果之一就是认知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被化归或消失。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客观性是一种通过统计学上的平均程序来消除和控制情感、偏见或利益的导向。一旦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的主观性被规训,自然就会垄断科学知识的产生,这并不需要涉及文化与社会。相应地,理性就对应着客观性,就能导致对外部实在的精确认识,认知者或观察者逐渐消失、不可见,最后转变为一种仪器式的机器,一种自我记录的装置。正是由于对认知主体力量的忽视,实证主义的客观性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 二 社会建构主义与“客观性”

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基于观察与理论水平上的基础主义、规范论、辩护、分界、内在论、理性主义与实在论,其特点是只着眼于客体对科学知识的主导力量。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打开了科学外史的大门,各式各样的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客观性的概念,实证主义的客观性观念受到了来自社会学领域的激烈挑战。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建构主义否定上述二分法,消解这些差别,颠倒原来的优先性秩序。作为一种自然主义纲领,它集中于其自身的主题:制造知识的过程。从这一点出发,它一开始就显示出外在论、反分界问题、反实在论、相对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特征,其基本特征是着眼于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建构力量。

建构主义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的文化,或一种生活形式,一场并没有任何接近客观性与真理的特权的交流或地域游戏。科学知识也像其它知识一样,被“社会建构”。它是地域的与语境的,可能“被性别化”和具有政治上的嫌疑。科学建构活动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它发生于一种普通的场所,在其中普通的人通过谈判协商、修补工具和仪器来获得实践的结果。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并没有遵从某些理性规则或普遍的“科学的逻辑”,正如夏平说的那样:“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展现了“科学知识制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境性”。<sup>[1]</sup>这正是后现代主义与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哲学家共同点,它们要告别绝对的客观性与基础的确定性。

在建构主义对科学的批评中,客观性体现出两个特征:

(1) 客观性是一种修辞;(2) 客观性是一种权力。

### 1. 作为修辞学的客观性

视客观性为一种修辞手段已经是很普遍的观点,这源于符号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家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文本分析。按照文本主义的观点,客观性是一组说服听众的一种文本与文学的修辞手段,以使读者相信某些陈述或命题准确地表达了一种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实在。在这方面,拉脱尔与伍尔伽的《实验室生活》一书最具代表性。在实验室中,当科学家告诉拉脱尔他们正在揭示自然真理时,拉脱尔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文学铭写”(Literary Inscription)系统。按照他们的观点,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主要关心的是以修辞学的手段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论文所陈述的一切应该被接受为真的。这种陈述的真与假并不是以客观事实为标准,事实与虚构的人造物之间

的区别也不是研究科学活动的起点。相反,正是通过实验操作这种手艺的技巧,一个陈述才被转变为客体,或一个事实才转变为一个人造物,科学家之间所讨论的是将一些陈述转变为自然事实。因此,实验室就像一个制造厂,事实就在一条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有些事实被制作出来,而另一些事实未被制作出来。这样,自然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种极端建构主义的结论便自然产生,这也就是拉脱尔实验室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3:“因为一场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达的原因,不是其结果,我们决不能用其结果,自然来解释怎么样,为什么一个争论已经被解决了。”<sup>[2]</sup>就是说,当人们接受某些事情,这些事情就变成了真理;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是真的,而是因为人们接受了它。各种争议解决的结果就是所谓的“自然”,并不是由“自然”来解决各种科学争议。从这一原则来看,外部世界纯粹是由科学家之间的谈判与协调的社会产物,一种社会的约定。“如果事实是通过实践操作被建构出来,如果实在是这种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么这就意味着科学家的活动不是被引向‘实在’,而是被引向陈述的操作”。结果是“结合了社会冲突的许多典型特征(如辩论、劝说、联盟),暗示着科学工作主要是一种文学的解释和劝服活动,又解释了迄今为止以认识论术语描述的现象(如证明、事实、有效性),一个科学‘论争场’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其它任何政治论争场。”<sup>[3]</sup>这就解构了科学在认识论上的优越性。阿姆斯特达姆斯卡认为拉脱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在整体上认为事实的命运最后是把握在使用者的手中,因为正是通过修辞学与修辞手段,人们被说服了,事实被编织了。在事实被制造的过程中,人们有着广泛的资源,包括说谎、错觉、错误、夸张、欺骗与误传等都可利用,这些资源被用来建构作为事实性的陈述。这正是罗蒂所说的:“客观性并不是对应着客体,而是与其它主体达成一致,除了相互间的主观性外,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东西。”<sup>[4]</sup>

修辞的确可以成为使一个陈述变成公认知识的显著机会,作为客观性的修辞学的确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些陈述比其它陈述更具有客观的可靠性。但是,修辞仅仅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仅仅是表面化的工作,主要是对应着科学交流或表达的公共舞台。但对客观性来说,修辞充其量是作为一种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建构主义把客观性与修辞学的关系本末倒置了,走向了主观主义的极端。

### 2. 作为权力的客观性

作为权力的客观性有着一种长期的历史,它开始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及其反理性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联系着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的哲学传统,是一个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理论,通过尼采、利奥塔、福柯,最终由社会建构主义贯穿到科学知识的领域。客观性的批判理论认为:客观性是一种从西方理性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逻辑中心主义”的叙事,其目的是排除边缘声音,客观性压制了沉默的地域文化、被殖民化的他者与他们的生活世界。客观性被抹上一层冷酷的与不被人注意到的工具理性的糖衣炮弹,这种工具理性一直有着一种贪求无厌的控制与操纵自然与人类的欲望。隐藏着男性至上主义特征的客观性在真理与进步的

无偏见性与价值中立性的外表后面行使着权力。

作为建构主义主要人物的夏平与沙佛,1985年发表了轰动学界的著作《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与实验生活》一书。在本书中,他们认为近代科学是在17世纪英国的“绅士文化”中诞生的,因此,科学理论的客观性是与科学家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实验的客观结果是由波义耳的绅士地位、名利、财富、宗教信仰所决定的,是和查理二世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根据夏平与沙佛的看法,新生的皇家学会,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与社会观点的产物与代表,客观性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家学会的意识形态产物。科学被表述为一场永不停息的残酷斗争,在范式中占统治地位的领袖借助于客观性的“公正”,借助于财富、地位和斗士的狡诈,笼络了大量的亲信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和地位服务。

与建构主义密切相联系的是某些后现代学界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按照后殖民的女性主义观点:客观性的科学已经被合法化为政治、法律、教育、社会政策和伦理等社会进步方面的唯一欧洲模式。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模式的模式是按照欧洲人与男性气概的理想加以界定的。欧洲文明向往的男性气概,就表现为现代科学的进步,而主流男性模式的欲望则表现为这些模式与现代性、合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因此,现代科学具有客观性的假说的意义,是通过与其它文化和女性对立的含义而确定下来的。在科学的客观性面前,“科学所具有的全球性权威地位,特别是与现代性、社会进步、人类独特潜能和以欧洲中心主义术语定义的男性气概等日益广泛的欧洲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权威地位,合谋压制了现代科学假说和热点的很可能是最可靠的选择方案。”<sup>[5]</sup>客观性命题被提升为一个唯一合理、进步、文明和通人情的理想模式,它是在反对非欧洲人,经济上脆弱的人和女性时确立起来的。这样,客观性被确定为一种欧洲扩张的经验结果,而不是作为一种有效的认识论原因。声称近代科学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就是一种低估地域关系或知识,合法化“外部专家”的政治学。因此,哈丁声称西方现代科学是理性的、客观的与普遍的说法,这只不过是“文明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象征,科学方法与内容完全是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父权制的一种有意图的共同建构。<sup>[6]</sup>更进一步,哈丁声称非西方世界中脆弱的群体实际上经历了所谓科学的价值自由与客观性的“粗暴与残忍的文化入侵的折磨”,因为他们“并没有价值中立,只具有自己的儒家、土著美国人、伊斯兰、毛利人……犹太人或基督教的价值。”<sup>[7]</sup>海伦·朗基萝(Helen Longino)呼吁女性主义与后殖民地人民相结合,特别是其中的受压迫的人民,发展出一种“敌对立场”,以揭示隐藏在现代科学的客观性的“背景假设、语言、模式、论证方式与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密码。在科学中,理性高于情感、客观性高于文化价值,不是因为它们使我们更接近真理,而是因为它们更加推进了父权制与帝国主义。

为此,哈丁提出了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客观或不客观被认为是某些个人或团体所有的属性,因为在‘妇女’(或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黑人、东

方人、享受福利者、病人等等)身上更感情化,更难以做到无偏见性,大多数的政治承诺使之难以得出客观的判断……客观性被认为是某些知识探索社群的结构属性。”<sup>[8]</sup>这样,强客观性要求科学家和他们的共同体与进步的民主纲领结成同盟,也就是说,不仅要求认识论与科学理性上的进步,而且还要求“道德与政治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主义的标准显得不足,因为它仅仅促进了‘客观主义’的发展。”<sup>[9]</sup>

建构主义的权力客观性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1)极端的相对主义;(2)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化。正因如此,这种做法引起了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愤怒,斥责其为反科学思潮。正如齐曼所指出的那样“客观性的衰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没有客观性的标准来遵从,建构性的强化将让位于解构性的衰退。”<sup>[10]</sup>

### 三 科学实践与客观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实证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处于问题的两个极端。实证主义把科学知识视为对自然的“镜像反映”,完全忽视了科学活动中的主体的力量,而社会建构主义总是要独立于客观实在去理解客观力量,于是,任何显示客观力量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实践活动从一开始便被清除掉。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它们都是脱离了科学实践去考察知识。自从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主编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一书出版以后,科学哲学的实证研究和社会研究开始出现转向,突出科学的客观维度的作用——在科学研究中全面地展示客观实在、事实、仪器、设备、实验组织体系的相互作用与意义。

在这方面,皮克林的工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在《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一书中,皮克林把科学描述为一组客观事实、仪器、理论、训练有素的人类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停的和永无止境的辩证运动,这一辩证过程表现在他称之为“实践的冲撞”中,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借助于各式各样的仪器为媒介相互之间的辩证运动,从而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科学,较全面地解释了科学实践中客观的、技术的、社会的、形而上学的与认识论上的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科学实践所特有的实在论特征,恢复了科学实践的辩证法。“我对科学的基本理解是:科学是操作性的,在其中,行动,也就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活动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是借助于机器奋力捕获的物质力量的行动者。进一步说,在这种奋力捕获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现的方式相互交织。它们各自的轮廓在实践的时间性中突现,在实践的时间性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撑……受制约的人类操作活动及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始终伴其左右。这就是我的全部构想的框架。”<sup>[11]</sup>

建构主义使我们脱离以纯粹的知识来理解科学,从客观实在走向建构过程,这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对科学的实在论语言的描述可能适合于经典的肉眼观测的天文学,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则与各种各样的机器携手并进,这种携手并进是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科学研究的特征。马丁

克里尔格 (Martin Krieger) 对“制造物理学”(doing physics) 的哲学人类学分析表明:科学的建构性语言描述具有工业革命后的“大科学”背景。然而,皮克林指出建构主义思考科学实践的社会建构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科学的客观性质。(1)“如果没有科学的客观维度,任何人都不能声称能够对科学进行分析。”<sup>[12]</sup>而科学的建构主义描述,仅仅意味着思考科学知识的一种特定的策略。它表明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探索贯穿于科学活动领域的知识产生和作用。(2)离开人类的力量,我们是不能理解科学实践的,但人类力量建构的最初目标和计划是不能决定实践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变着的物质力量和人类(规训)力量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过程中,在多重物质和概念的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式稳定中,不断地调整与重组这些目标与计划,因此,人类活动的目标与计划本身就是辩证运动的科学实践的有机构成,而不是像社会建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外在于实践的科学活动的先定导向。同时,包含着知识、以及机器、仪器、各种规训、社会关系等等的科学实践的产物,通过冲撞过程,必然地从人类力量的主观性或主体性(其本身又是实践的有机构成)中分离出来。“这种经由与物质力量与各种人类力量对抗而实现的对人类力量的动机性结构的脱离,便是冲撞展示给我们的科学的客观性的基本内涵。”<sup>[13]</sup>

在科学实践中,与客观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相对性。在科学实践中,一些社会特性,如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等,贯穿于实践活动的始终。同时,科学文化的技术要素,包括认识论规则,会围绕着这些社会结构及要素不断地重组,这就使科学的实践带有相当的相对性。因此,“文化扩展中知识生产的相对性本身就具有不确定重组的特性”。<sup>[14]</sup>但计划、目标、科学家的利益,人类活动者的活动范围和社会关系,各种规训和专业技术,所有这一切本身都是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它们都不会外在于实践来控制实践。因此,皮克林认为这不会破坏科学的客观性,不会走向社会建构的相对主义,也就是说,不会把科学的成果依附于不同的范式利益。如众所周知,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理论提出后,科学的客观性、进步及其合理性规则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社会建构主义正是由此走向了反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皮克林在《建构夸克》<sup>[15]</sup>一书中对不可通约性作出了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力图“挽救现象”。通过对“夸克”的新旧理论的对比,皮克林发现旧物理学理论在实践中经由一套机器操作的实践把自身与自然联系起来;新物理学在实践中则以一套完全不同的机器操作参与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皮克林强调的是这种实践中的不可通约性的物质性维度。这就是新物理学家与旧物理学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的意义。这里皮克林与库恩不同之处,他是研究物质世界的不同的科学实践,而不是在不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并且,皮克林还强调科学的进步性,“在从旧物理学转向新物理学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远远不止于知识和仪器设备。旧的技艺和规训贬值,新的技艺与规训升值。”<sup>[16]</sup>这样皮克林避开了反实在论,在科学实践中“挽救了现象”。皮克林说:在科学实践中,

“科学的物质层面、概念层面、社会结构层面的不间断的重构,使得把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具体化为特定的程序化成为不可能,这种不可能性正是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的结果,这种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又使实践中的各种转换产物具有客观性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经由对实践的分析理解科学知识时,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便不再是剑拔弩张。”<sup>[17]</sup>科学文化,包括科学知识,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产物,因而其便具有了内在的历史相对性。

总之,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决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sup>[18]</sup>皮克林承认马克思的思想是他的思想重要来源,他常常以马克思的话为引言来展开自己的论述。

### 【参 考 文 献】

- [1] Shapin, Steven. "Here and Everywher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1995. 305.
- [2] Latour, Bruno. *Science in Action*. Milton Keynes, Buck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258.
- [3] 赵万里. 科学的社会建构[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201 - 202.
- [4] Rorty, R.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71 - 72.
- [5][6][8] 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248、232、171 - 172.
- [7] Harding Sandra.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Challenges,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Uncertainties*. *Configurations* 22. 1994. 319.
- [9] Harding, Sandra.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J]. in *Feminism and Science*, E·F·Keller and H·E·Longino (eds),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5.
- [10] Ziman, John. "Postacademic Science: Constructing Knowledge with Network and Norms", in Ullica Segerstrale (eds): *Beyond the Science Wa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152.
- [11][12][13][14][16][17] Pickering, Andrew.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21、195、202、198、208、216.
- [15] Pickering, Andrew. *Constructing Quark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80.

(责任编辑 成素梅)